

执行摘要

一个经济体的长期经济前景不仅取决于经济产出增长的近期前景，而且还取决于社会如何分享这种增长的利益以及这种增长对环境产生何种影响。因此，可持续发展目标 8 要求促进持久、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事实上，如果在经济复原力、社会包容和环境可持续所有这三个方面取得进步，民众和社会的福祉就会增加。毫无疑问，亚太区域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进展。然而，本区域各经济体内部和之间的经济不平等现象有所加剧，而且经济产出的迅速增加导致环境退化、状况难以维持。《2018 年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概览》根据这些考虑对各经济体的经济前景做出分析，并讨论了可有助于各国有效实现这些目标的政策选择。

《2018 年概览》深入探讨了融资支助各种政策举措的重要性，同时审查了亚太区域各国政府如何增加国内公共财政资源并借助私人资本加强各经济体的长期前景。

按照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衡量，亚太区域的经济表现继续稳步改善，而通货膨胀保持稳定。目前的关键任务是确保这种经济业绩长期持续下去，使每个人受益，并尽量减少对环境的不利影响。《2018 年概览》指出，金融风险和保护主义贸易措施对近期宏观经济前景构成压力，而提升本区域潜在经济增长和持续减贫的中期挑战继续存在。此外，虽然迅速的技术进步将带来众多的机会，但也对就业两极分化以及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构成了相当大的挑战。中国追求创新、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这也可以从贸易、投资和其他渠道对区域产生重要影响。

《2018 年概览》建议亚太区域各国政府利用目前有利的经济条件，解决脆弱性问题并加强自身经济复原力、包容性和可持续性。政府必须在这一努力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时又有一系列可动用的政策选择。要执行若干政策举措，不仅需要将公共和私营部门的现有财政资源用于可持续发展，而且还需要创造更多的财政手段。《2018 年概览》探讨了若干发展筹资问题，并审查了各国政府如何有效调动发展资金，同时也认识到各国的具体优先事项和情况可能有所不同。

本报告结构如下：第一章从总体和次区域两个层面对亚太区域的经济业绩和前景作了最新和详细的评估。报告讨论了宏观经济风险，并分析了可能对持久、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前景产生不利影响的种种中期挑战。最后分析了应对这些风险和挑战的各种政策选择。第二章深入研究了利用发展融资作为一种重要手段以便有效执行第一章所强调的一些政策的重要性。本章主要侧重于增加国内公共财政资源并借助私人资本支持经济的长期前景。鉴于本区域的多样性，并且瞄准选定发展筹资问题，第三章就下列问题提供了次区域分析：处理不稳定的财政状况（太平洋）；开展税收改革以提高政府收入（南亚和东南亚）；发展当地货币债券市场（东南亚）；增加中小企业获得资金的机会以加强多样化（北亚和中亚）；以及发挥金融技术的潜力（东亚和东北亚）。

经济业绩与展望

据估计，2017 年亚太发展中经济体持续获得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达到 5.8%，相比之下 2016 年为 5.4%。约三分之二的区域经济体——占本区域国内生产总值的 80%以上——2017 年实现了比前一年更快的经济增长。就中国而言，全球对其产品的强劲需求、富有弹性的私人消费和服务活动继续推动该国的经济增长。然而，随着努力遏制某些行业的污染和产能过剩，投资趋于温和。印度最近实行商品和服务税，再加上公司和银行资产负债表疲软，导致经济增长放缓，但已经出现复苏迹象。俄罗斯联邦经历了两年的衰退之后，借助石油价格上涨、通货膨胀和信贷条件更加稳定而恢复增长。本区域最不发达国家在强劲的贸易和投资流动的支撑下达到了 6.8% 的增长，这是十年来最快的。

全球制造业、投资和贸易最近的复苏为亚太区域业已稳定的经济产出增长提供了顺风。这一增长是五年来全球产出增长最快的一次，但在此之前经历了长期投资疲软和生产率增长缓慢。因此，这些趋势能否持续仍不确定。此外，姗姗来迟、但超过预期的强劲复苏自身也带来了挑战。其中包括：预期利率会更快上升，这可能引发金融市场的波动；尽管曾在 2017 年疲软、政策不确定性继续存在但美元走强、以及石油价格相对最近的趋势较高。不过，预计 2018 年和 2019 年全球产出将分别增长 3%和 3.1%，与 2017 年的 3%预估值一致。

近年来增长缓慢的投资支出和贸易额在 2017 年时显示出复苏迹象。全球需求的增强和公共基础设施支出的增加支撑着投资的增加。中国的需求更加刚性，广泛使用区域生产网络的电气和电子产品贸易出现全球反弹，推动了贸易额的增加，但是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金融条件的收紧以及国内法律和监管环境的不确定性可能损害投资的持续复苏。同样，2018 年贸易额增长可能放缓，原因是 2017 年的增长是基于前一年的疲弱表现进行衡量的，“基础效应”显高。此外，中国增长放缓可能会反映在其进口需求上，尤其是对金属和其他与投资有关的商品的进口需求。

在刚性内需和全球经济前景改善的支撑下，预计 2018 年和 2019 年亚太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率为 5.5%，中国略有放缓，但印度的复苏和本区域其他国家的稳定表现可将其抵消。随着本区域购买力不断增长，国内私人消费可能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但在本区域将近一半的国家中，40%最底层人口原已很低的消费增长速度仍低于普通家庭。此外，如果没有生产力不断提高支撑下的实际工资持续增长，消费主导型增长可能导致债台高筑，并造成金融脆弱性。因此，减少不平等并投资于生产力增长将有助于持续和有复原力的经济增长。

预计 2018 年和 2019 年亚太区域发展中国家的消费价格通胀将升至 3.5%，而 2017 年为 3.2%。这种增长与全球石油价格上涨和总需求增强的情况一致。尽管

通胀回升，但仍可保持在较低水平。除了收成良好和粮食价格稳定等具体国家因素外，还有一些与能源部门、货币、产能利用和技术相关的全球性因素也是通货膨胀保持稳定的原因。第一，尽管欧佩克¹ 同意削减石油产量，但鉴于美利坚合众国开采页岩油成本的降低以及可再生能源价格的大幅下跌，预计油价不会进一步上涨。第二，多个经济体的货币升值缓解了价格压力。第三，各经济体的运作可能仍然低于潜力，实际工资和正规就业增长放缓反映出产能的疲软。第四，全球价值链和电子商务可以较低成本满足需求，而生产过程中更多使用机器人的做法减轻了对工资和价格的压力。

经济前景面临的宏观经济风险和中期挑战

尽管新的贸易限制措施 2017 年有所缓和，但是全球和本区域各地新的贸易自由化措施有所放缓。此外，非关税措施也有所增加，而这些措施透明度更低，危害可能更大。贸易壁垒的升高可能破坏跨境生产网络，不仅影响贸易，而且还会影响长期投资和生产力增长。需要以多边方式推行贸易自由化措施以加强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且还需要努力解决与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相关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包括采取国内补充性措施，帮助那些遭受不利影响的工人和公司。南亚和最不发达国家仍有很大空间可从贸易中获益。

进入亚太区域的资本流量减少及与之相关的金融脆弱性无法排除。迄今为止，本区域的贸易差额仍然基本可控，而且由于本区域经济的蓬勃发展，资本流入也很强劲。这一趋势推动本区域货币相对坚挺和外汇储备的改善。不过，鉴于美国和欧元区近期的经济复苏可能使利率的上升高于预期，从而导致资产价格修正和汇率波动，这种趋势很容易出现逆转。在有些经济体中，无论是中国的企业层面还是马来西亚、大韩民国和泰国的家庭层面，私人债务的居高不下和不断上升已成为金融脆弱性的一个根源。私人债务的迅速增加和外部条件的变化很容易影响整个金融体系，1997 至 19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本区域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一年来，美元疲软和油价上涨的叠加也是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的根源。虽然 2017 年时美元疲软为其他国家逐步适应财政紧缩提供了一些空间，但是基线预测认为美元将随美国经济的走强而坚挺，不过其发展轨迹和净影响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美元走强不仅影响贸易竞争力，还会影响美元贷款和美元计价债务。与美元直接绑定的货币更易受到潜在的不利影响。同样，今年年初全球油价达到每桶 70 美元，与两年前的每桶 30 美元相比大幅上升。虽然预计会有所缓解，但是大量进口石油的国家可能面临更高的通胀和经常账户赤字。石油出口国受到的影响则基本相反。

¹ 指与非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成员合作，通过减产提高油价。

至于中期前景，由于人口老龄化、资本积累减缓和生产力增长缓慢，多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呈下降趋势。这种局面可能对持续减贫和提高生活水平产生不利影响。到 2050 年，预计本区域每四人中就有一人年龄达到 60 岁以上。除其他影响外，这样一种人口结构的变化可能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本区域各经济体在收入相对较低的情况下还面临着人口的日益老龄化，因此要提高增长潜力将需要更高的生产力增长。亚太区域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增长始终不力，而且在 2000 至 2007 年和 2008 至 2014 年期间下降了一半以上。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包括技能和基础设施不足、资源分配效率低下以及技术创新和推广乏力。

技术的飞速发展提供了巨大机遇，也带来了挑战。三维打印、大数据、生产过程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迅速，未来还可能引发生产力主导型经济激增。同样，金融技术和电子政务应用也是支持可持续发展的技术。然而，技术和创新对技术工人和资本有利，对非技术工人和劳动力不利，由此会加剧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虽然对于新技术是否会取代劳动力从而减轻对工资的压力存在不同看法，但都有可能加剧就业的两极分化。此外，发达国家和中国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可能会缩小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的空间，从而削弱这些国家扩大体面就业机会的能力。

中国努力实现创新、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这可以通过贸易、投资和其他渠道对本区域产生重要影响。如果中国正在进行的结构性改革取得成功，则全要素生产率将超过集资成为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并且到 2030 年服务业将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70%，接近发达经济体目前的水平。此种变化将会对中国的贸易结构产生影响。随着中国向价值链上游移动，孟加拉国和越南等国可以有更多机会参与低技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然而，目前的技术出口国可能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大宗商品出口国也可能在短期内受到不利影响。尽管如此，从中期来看中国国内市场的蓬勃发展对本区域的贸易伙伴而言是一个好兆头。同时，过去十年间中国在本区域的对外投资稳步增长。展望未来，中国投资的质量和数量对于接受国的经济发展和互利的贸易关系将是重要的。

贫困发生率相对较高和不平等的加剧正在对本区域的活力和经济前景产生不利影响。尽管本区域在中国的引领下极端贫困显著减少，但在若干经济体、特别是南亚和最不发达国家中的贫困发生率仍然相对较高。在整个区域中，很大一部分非贫困人口仍然容易返贫；他们可能被界定为“过渡阶级”而非“中产阶级”的一部分。此外，诸如技术进步、全球化和市场化改革等因素已为迅速的经济增长提供支持，它们正不断造成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加剧，这对于本区域的包容性发展并非好事。人们愈发认识到，严重的、不断加剧的经济不平等对于持续的经济增长是不利的。

有关持久、包容和可持续经济增长的经济政策

货币和金融政策的重点应当是在更强劲的全球增长的推动下，支持向预期的通胀逐步回升和金融紧缩的平稳过渡，同时通过适当的宏观审慎措施来应对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2017年，由于通胀稳定，本区域大多数国家保持政策利率不变，甚至进一步降低政策利率。尽管通胀前景总体稳定，但考虑到最近美国和欧元区油价上涨、金融部门面临风险以及加息速度超过预期，这种趋势可能不会继续下去。因此，应考虑逐步提高本区域各经济体的利率。中央银行应加大力度去杠杆化，以应对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并且对于加强宏观审慎框架、监管和监督给予优先关注。考虑到高水平的私人债务和严重的银行不良贷款制约了稳健的投资，这些措施都是重要的。

随着对于短期刺激政策的需求减少，财政政策应当将重点放在提升生产率增长和减少不平等上。在2016年财政赤字增加、占国内生产总值接近3%之后，2017年财政赤字有所稳定，在更为强劲的经济增长的支撑下，预计在预测期内财政赤字将有所缩减。此外，亚太经社会的财政可持续性差距分析表明，在基线情景中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债务比例将趋于稳定或者有所下降。虽然这些都是令人鼓舞的，但需要更多关注政府支出的构成和质量。教育和保健成果对于劳动生产率是重要的，但是在柬埔寨、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等国的教育和保健支出总和仍然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本区域有一些正面的实例。若干国家已确定财政空间的新来源，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和社会福利，包括通过重新分配部分军事支出或者逐步取消累退的能源补贴。

除重新分配预算之外，各国政府还可以提高支出效率，确保平等享有基本的公共服务。如果不付出这些努力，则可能无法将额外支出转化为更好的发展成果。有关公共支出效率的估算表明，许多国家仍有充裕的空间进行改善。例如，为取得相同水平的教育和保健结果，与本区域走在前列的其他国家相比，巴基斯坦可将其教育和保健方面的公共支出减少约33%和17%。同样，据估计，由于效率低下，丧失了大约30%的公共投资潜在收益。虽然有一些针对具体部门的方法来提高支出效率，但是贯穿各个领域的因素是善治。政府可以改善财政治理的方式之一是通过利用技术；例如，那些积极应用电子政务工具的国家往往在腐败认知方面表现更好。

提升生产率需要采取“整个政府一盘棋的方法”，以促进科学、技术和创新以及对于相关技能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同时，各国政府可以考虑采取范围广泛的再分配措施，以缓解由技术引起的不平等和失业风险。信息和通信技术(信通技术)基础设施对于支持创新增长和缩小现有的数字鸿沟至关重要。为了培养使人们对于由新技术带来的迅速变化作出灵活、敏捷的反应所必需的核心技能，应当鼓励更多的学生、特别是女学生选修有关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相关课程。同时，为了减轻对收入分配的潜在不利影响，各国政府可以考虑实施累进所得税以及与

财富相关的税收。更激进的建议是保障人人获得基本收入，根据这项建议每个人都可以获得无条件的现金补助。一项基本的计算表明，亚太区域用以保障人人获得基本收入(旨在为劳动适龄人口每日提供 1.90 美元)的财政成本可能平均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4%。

虽然亚太区域在减少赤贫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但快速结构转型带来的压力——从不平等加剧到环境退化——已经变得更为严重，正在威胁到本区域的经济活力。如果不提高增长质量，经济复原力也将受到影响。各国政府可以加强社会保障，将其作为增强经济复原力的战略性方式，尤其是考虑到人口过渡(一方面青年面临技能短缺的风险，另一方面老年人面临贫困的风险)、劳动力市场受到与改革和技术创新相关的干扰。同时，各国政府可以将资源效率目标纳入国家计划和预算以及各部门政策的主流，并制定适当的法律和监管措施以执行标准和提高认识。碳税和排放交易体系可以在向低碳、具有气候复原力的经济转型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为促进持久、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调集筹资

上文所讨论的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工作将不仅需要有效利用来自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现有财政资源，而且还需要提供额外的财政手段。若干现有的估计数显示，使经济体具有复原力、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投资需求是可观的——对于全球范围所有发展中国家而言平均每年高达 2.5 万亿美元。好消息是，亚太区域拥有充足的财政资源和储蓄，这些资源主要集中在私营部门。例如，估计亚太发展中经济体的国际储备、上市公司市值、以及金融机构、保险公司和各类基金所持有的资产的总价值约为 56.2 万亿美元。可能调集这些私营部门资源中的部分资源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例如，《2018 年概览》显示，适当的政策环境可以增加机构投资者对于长期基础设施项目所作的投资。同样，上市公司和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影响力投资和企业社会责任等举措为实现社会包容性和环境可持续性直接提供支持。

各国政府应当发挥牵头作用，以加强必要的投资并且促进私人资本的杠杆化。应考虑采取多管齐下的战略：首先，应通过有效的支出管理，高效利用现有的财政资源，以便通过同样数额的财政资源实现更大的发展影响。改善治理是这方面的关键所在。第二，应通过加大力度，以负责任的方式增加收入、以及来自金融市场的借款，从而加大财政空间。第三，应当利用可持续发展目标，以便向未来的私人投资提供指导，并且确定公共资源可能流动和需求可能增长的领域。第四，公共融资应被视作催化剂，从而吸引私人资源而不是取代私人融资；初期的公共支出为增加私人投资铺平了道路。第五，应制定适当的规章和体制框架，以便打造私人投资的空间。第六，应制定更好的系统性风险指标(与治理不善、合同执行不力和容易导致不稳定等方面相关的风险)，以便反映在经济以及社会和环境方面的进展情况。政府的政策和公共投资，例如旨在改善司法体系、提高人口的

生产率和实施有效的自然灾害预防的政策和公共投资正在去风险化；在考虑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努力进行投资时应对其予以考虑。

提高税收仍应作为本区域若干经济体、特别是南亚和西南亚次区域的高度优先事项。在最近几期《概览》中一直重点指出了强健的财政状况在引导经济增长战略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例如，在《2014 年概览》中，依照各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对亚太各经济体的税收潜力进行估算，同时强调需要：(1)通过简化程序和增加使用信息技术以加强税务管理；(2)通过理顺现有的免税待遇和新增税项来扩大税基。《2018 年概览》审查了所建议的税收政策，如果加以实施，将在何种程度上有助于缩小差距，进而扩大了分析范围。

通过减少避税和逃税的做法、包括通过影响人们的纳税意愿，改善税务管理将有助于增加税收。为了衡量亚太发展中经济体的税务管理质量，《2018 年概览》建议制定一项新的税务管理综合指数，以衡量机构安排、核心业务职能、法律和政策框架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使税务主管部门得以处理避税和逃税问题，从而提高税收征收效率。新指数将汲取来自税务主管部门的调查信息，目前已经为 60 个经济体、包括亚洲及太平洋 14 个经济体所用。根据新的指数，亚太区域发展中经济体的税务管理质量与世界其他区域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更不乐观，在机构安排方面更是这样。

提高税务管理质量对于各国税收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的水平具有重要影响。在《2018 年概览》中估计税务管理指数值每增加一个点，国内生产总值中税收所占比例就增加 0.15%。如果假定亚太区域个别经济体的税务管理指数值与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的普通成员国所观察到的水平相匹配，则缅甸和塔吉克斯坦等国的潜在收入影响可能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 8%，在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大国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4%。

通过使外国直接投资的税收激励措施合理化来扩大税基以及实施碳税都是可以为提高收入所实施的政策选项的范例。根据亚太区域 9 个发展中经济体中超过 28 500 家所注册的外国公司的企业级财务数据，《2018 年概览》估计，与外国直接投资激励措施相关的税费总支出接近 160 亿美元。在某些情况下，放弃的税收规模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 0.3%。尽管需要使外国直接投资的税收激励措施合理化，但政策优先事项应当是通过提供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监管框架和体面的基础设施等方式来改善投资环境。加强区域合作可以有助于避免本区域各经济体竞相提供更加慷慨且无度的外国直接投资税收优惠。同样，《2018 年概览》还估算出亚太区域 38 个发展中经济体合在一起，碳税可以每年产生约 430 亿美元的额外税收。平均而言，税收总额的预计增幅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0.16%，在碳强度较高的一组国家中已增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0.21%。一个值得重点指出的是，碳税通常是递减的，因为较贫穷的家庭在电力服务上的支出尤其高，而电费可能因

加收碳税而上涨。因此，政府应当考虑在其他方面减税，以便抵消能源价格的上涨和/或通过将碳税收入用于可以促进绿色技术开发的方案，从而在短期内不会增减碳税收入。

在密切监测和维持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的同时，应考虑从金融市场筹集更多的审慎主权借款。对于亚太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发行公债并不常见。在 47 个有数据可查的国家中，20 个国家从未发行过政府债券，11 个国家只发行过国内公共债券，16 个国家发行过国内和外国公共债券。即使那些过去发行过公共债券的国家，发行债券的量一般比较有节制。2018 年《概览》显示，根据统计分析，对于那些债务存量较少、监管框架较好、经常账户业绩较有利的国家，如在国内和国际市场发行政府债券，其成功率往往较高。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的经常账户余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增加 1%，其发行国内政府债券的可能性将增加约 7%。更高的监管质量产生的影响更大。

然而，如考虑到或有负债，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可能会减弱。现有数据表明，为支持持久、包容性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许多亚太经济体能够承担更高的公共债务。事实上，预计在未来五年，在亚太 24 个发展中经济体中，11 个经济体的公共债务水平将从 2017 年占国内生产总值 42.5%这一比较有节制的水平降至 2022 年占国内生产总值 42%。进一步的债务可持续性分析表明，在 41 个亚太发展中经济体中，22 个经济体的公共债务困境风险较低，8 个国家的公共债务困境风险较高。这 8 个国家中的大多数是最不发达国家，如阿富汗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等，以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如马尔代夫和萨摩亚等。虽然公共债务可持续性不是大多数亚太经济体的眼前关切，但各国政府应密切监测银行部门失灵、国家以下各级政府债务违约、国有企业运作和自然灾害可能产生的或有负债。

确保有利的政策环境对有效利用私人资本，例如为此建立公私伙伴关系，至关重要。有利的政策环境有助于降低投资风险，如因宏观经济不稳定和政治不确定性造成的风险。例如，《2018 年概览》提出了一个综合指数，用以评估一个国家就基础设施项目建立公私伙伴关系的准备就绪程度。该指数称为公私伙伴关系扶持环境指数，它包括五个次级指数：(1) 公私伙伴关系项目的体制安排；(2) 过去公私伙伴关系的经验；(3) 宏观经济稳定性；(4) 金融市场的发展情况；(5) 相关法律和监管框架。分析表明，在环境更有利的国家，公私伙伴关系基础设施项目往往获得更高的风险调整后回报，在商业上更具可行性。《概览》进一步显示，这一新的指数值每增加一个单位，就会带来公私伙伴关系基础设施投资额 5% 的增长。在五个次级指数中，法律和监管框架质量的作用影响最为明显。然而，尽管潜在的好处很大，但在执行公私伙伴关系项目时应谨慎行事。因为政府可能需要接管私人伙伴未能交付的项目，从而可能会产生更多或有负债的风险。

为了释放公私伙伴关系的潜力，并支持发行主权债券，亚洲及太平洋需要进一步发展金融市场。发展金融市场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在各方面采取政策行动，例如：(1)有效的发行流程法律框架；(2)相当大的投资者基础；(3)多套多样的金融工具和服务；(4)知识渊博的金融中介；(5)具有扶持性的市场基础设施，例如信贷评级机构和债券定价机构。为了说明问题，《2018年概览》介绍了下列两个方面的分析：(1)通过加强机构投资者的作用，扩大投资者基础；(2)通过探索伊斯兰金融的潜力，使金融工具多样化。还介绍了围绕东南亚次区域本地货币债券市场发展的若干问题开展的案例研究。

最近金融科技的突破在塑造金融对经济和社会的预期作用和影响方面也具有相当大的潜力。金融科技影响着信贷和股权(例如众筹)的获取、金融普惠性(例如，在偏远地区使用网上银行)、资金转移(通过初期的技术突破实现，例如区块链技术或无现金支付)。这种转型影响信贷的供应和需求：通过更加简易的支付影响总需求，通过创新和投资影响总供给。在亚洲及太平洋，一些次区域正在对金融科技进行大量投资。特别是，随着决策者通过监管改革和优惠税收计划等做法，对其发展加以管理，东亚和东北亚正走在此种转型的前列。

综上所述，亚太区域目前强劲的经济表现为各国政府启动能够使经济具有复原力、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政策提供了一个适当时机。政策选项的实例包括：确保财政部门 and 对外部门的稳定，有效利用和扩大财政空间，加强再分配措施和社会保护，促进科学、技术和创新，以及对相关技能和基础设施进行投资。要落实其中若干政策，不仅要使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现有财政资源用于改善经济的长远前景，而且还要设法采用额外的财政手段。报告审查了此类筹资战略中可增加国内公共财政资源和利用私人资本支持可持续发展的若干要素。基本论点是，为发展调集资金的前景是光明的。